

中国戏剧

论辩 上

主编 / 田本相

田本相 / 宋宝珍 / 刘方正 / 著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

● 艺术卷



一
十
五
一
国
家
重
点
图
书
出
版
规
划
项
目

ISBN 978-7-80742-182-5



9 787807 421825 >

定价:69.80元(上、下)



中国戏剧论辩

①上

◎田本相 / 宋宝珍 / 刘方正 / 著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艺术卷◎主编 / 田本相◎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总序

邓光东

翻开中华民族五千年史册，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刚刚过去的公元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最为复杂尖锐，斗争最为激烈，社会变革最为急速深刻的一百年。

这一百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结束了在中国沿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完全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成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和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新中国像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一百年，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救亡图存，为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远涉重洋、孜孜不倦、上下求索，或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开拓创新，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就义、慷慨赴死，涌现出一个个思想巨擘、学术巨人、英雄豪杰、民族骄子，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活剧。一百年，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公元二十世纪的中国，却经历了三种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现象，既

是历史奇观,也是历史奇迹,是中国历史的壮举,为世界历史所罕见!它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主宰自己命运的坚强决心、非凡勇气、无穷智慧和巨大力量,雄辩地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伟大民族、优秀民族!

二十世纪的中国之所以发生遽变,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打破生产关系的束缚,而经济基础的变革需要思想解放和上层建筑的变化,因而纵观古今,放眼中外,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理论创新为先导,以百花齐放、学术繁荣为前奏。如果说,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适应并推动了社会变革,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则解放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那么可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正是在各种思潮相互冲突、相互交锋、相互激荡、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背景下发生急速而深刻变化的。这个世纪的学术繁荣,是继春秋诸子学说之后的一个学术思想巅峰,其问题之复杂与纷繁、规模之巨大与宏伟、内容之丰富与新颖,又非春秋战国所能比拟,而其对社会进步影响之深远,则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明显。

如今,二十世纪渐渐远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历史。然而,二十世纪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对于正在从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中国人民,却是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应当忘记的。这个世纪,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中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世纪,是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世纪,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世纪,也是最值得我们缅怀和纪念、清理和评估、反思和总结的世纪。因为,在这个世纪中,中华儿女从来没有中止过学习与实践、思考与奋斗、探索与拼搏;因为,在这个世纪中,中华儿女有太多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悲痛、经验与教训。仅就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学术领域而言,就造就了许多重要学术人物,涌现出许多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学术思潮、学术流派,进行过许多重要的学术论辩,产生了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所有这些,像奔腾不息的江水,像璀璨明亮的群星,像振聋发聩的春雷,像熠熠闪光的瑰宝,汇成巨大的精神动力,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所有

这些,都需要我们站在百年之交、千年之交的门槛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回顾与反思、梳理与廓清。

哲学社会科学和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文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思想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学术,归根到底是人们理性思维的结晶。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时代的巅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性思维。中华学术,从来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问题,历来就与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相联系。它既是一个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个时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所谓纯学术问题当然存在,但它的存在也不是孤立的。我不赞成把所有的学术问题都与政治挂钩,特别不主张学术问题政治化。但有些学术问题确与政治密切相关,尤其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相关。只要我们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研究二十世纪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领域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的一次次学术论辩或学术争鸣,就不难得出上述结论。正因为如此,我们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在上述几个领域的学术论辩问题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客观实际出发,详尽地占有材料,做一番去伪存真、去芜存精、由表及里的工作。认真地回顾和总结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对经济、政治、社会影响较大的历次论辩或争鸣,反思其是与非、成与败、功与过、得与失,寻找其发生的历史、社会缘由,探究其发展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做好这项工作,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彰扬前贤、昭告后人,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所幸的是,黄楠森、邢贲思、方克立,龚书铎、李文海,费振刚、

韩兆琦、郭志刚，田本相、倪震、梁茂春、邓福星诸同志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欣然分别担纲《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哲学卷、史学卷、文学卷、艺术卷主编，为本书系的学术品位和书稿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从1999年底开始就积极策划编辑出版《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经过组织有关专家论证，已将该书系列入“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书系的作者和主编们为撰写书系，搜集了大量原始资料，翻阅了无数重要文献，耗费了许多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学术界的不少专家，纷纷关注和支持该书系的出版。所有这些，令人感奋，令人欣慰。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是一套熔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炉的大型系列书籍，是二十世纪关于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重要学术思想的汇要，共四卷四十册。书系的作者们以严谨的治学精神、科学的论述方法及酣畅流利的文笔，努力坚持“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有述有评，述评结合”的原则，力求做到反映历史客观真实，介绍观点全面准确，叙述过程简明扼要，评论评价公正公允。全书基本理清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领域百年学术论辩主要问题的脉络；对所列论辩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析；以历史和全局的目光，对一百年来各种重要论辩资料进行重新审视，从而使人们对历次论辩产生了新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由于该书系是作者个人的科研成果，虽经主编们认真审校，仍属作者自己的作品，见仁见智，亦属自然。

值此书系陆续付梓之际，受各分卷主编的委托，写下以上这些话，是为序。

2004年11月

主编前言

田本相

百年来,在中国的文化思想界、文学艺术界,展开史无前例的大大小小的无数次的讨论、论争、论辩以及批判或大批判。就其规模、程度、表现形态,恐怕在世界文化思想史上都是少见的。

戏剧戏曲界的学术论辩也是这样,它是文化艺术大论辩的组成部分。

我赞成陈来同志的说法:

鸦片战争一百年来的与现代化西方撞击的中国历史的主题,事实上就是“现代化”。在文化意义上,可以说根深蒂固的文化民族主义产生认同传统的意识,与出于现代化急迫要求而产生的反传统倾向,两者的矛盾起伏构成了整个近代文化的基本格局。其中的基本矛盾就是“Centinuity and Change”,这也是近代世界文化史的普遍意义的课题。^①

就戏剧戏曲界的论争,基本上也是在这样一个基本矛盾上展开的。主要的论题大体包括如下几个问题:政治与戏剧的关系;如何对待传统(自然包括传统戏曲),如何对待外来的戏剧等。

首先,是政治和戏剧的关系。在近百年的戏剧戏曲的论争中,政治对于戏剧戏曲来说,都是一个纠缠始终的因素。不能说所有论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政治有关,但是,说它们都带有政治社会性,是大致不错的。

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腐朽的文化传统,导致所有的文化思想界的论辩,必然是对于传统的挑战,必然是与强烈的改变腐朽的要求相联系的。要现代化,就必然将矛头对准了腐败的政治。譬如晚清的戏曲革新和话剧的引进,就其历史动机来说,就是植根于“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之中的。可以说,话剧是在民主革命的浪潮中,中国人主动引进的“武器”。早期话剧的兴衰以及环绕着它的大讨论,其背后交织着的是激烈的传统同反传统的矛盾,内蕴着深刻的政治愿求。

就话剧来说,起先的引进者,并没有把它作为艺术来对待的,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作为启蒙的思想工具,接着,就把它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直到把它作为专政的工具,戏剧是为政治服务的,是必须服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随着话剧政治功能性的演进,也自然决定论争的内容和性质。“文革”就是以姚文元对一出戏《海瑞罢官》的批判而开场的,把戏剧变成致治的附庸。

其次,在政治和艺术相关的论争中,在文化层面就是对待传统的问题。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派提倡新剧并首先向旧剧开战,为此所展开的一场新旧剧论争,其实是对于旧剧的大批判。现代化的急迫要求使得胡适这些学者,也顾不得对于旧剧的研究,也顾不得学理,就对中国的旧剧展开无情的批判,把一切帽子都加到旧剧的头上。说是新旧剧的论争,其实是一面倒的。自然,也似乎可以说这样的批判为新剧的诞生“开辟了道路”,但是,也开启了现代非学理批判的先河。就像毛泽东后来说的“好的一切皆好,坏的一切皆坏”的形式主义,我称之为“非学理思维”、“非学理方法”成为百年学术论辩史上一种惰性的遗留。

如果说,新旧剧论争,非学理的批判,只是不讲道理罢了,大体还范围在文化思想领域,而后来的发展,戏剧和戏曲界的论争,搅入政治以及政治斗争的漩涡,由此,戏剧学术论辩打上或深或浅的政治烙印。无论人们如何厌恶、憎恨这样的政治的纠缠,起码在中国有它的必然性,并非某个人所能承担。历史就是这样的。由非学理思维演进到“学术政治思维”“政治学术思维”,显然,也渗透

到几代学人学术心理之中。

重新审视百年来的戏剧学术论辩历史,我们可发现不少被历史蒙蔽的真知灼见,发现不少有识之士。真理不见得在强势的一边,而在被批评被批判的一边。譬如,对于旧剧的看法,宋春舫,以及国剧运动的一些论者,他们的见解较之胡适等人更正确。

再次,与反传统相联系的就是如何对待外国戏剧?对待传统(包括传统戏曲)和对待外国戏剧就像一个铜板的两面,从五四时期开始,直到现在,争论都环绕着这样两个问题,而且纠缠在一起。在话剧问题上,本来是从西方引进的,似乎不发生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只有如何对待外国戏剧的问题,其实不然。这样一个外国剧种落户中国,就是一个不断被中国人接受改造的转化过程,被中华民族接受消融的历史。曹禺先生曾经这样说:如果我和夏衍、吴祖光这些人对于中国的文学和戏剧的传统缺乏修养,我们就没有能力消化这个外国东西。有人说,曹禺的戏都是抄袭外国人的,但是,曹禺却说,我毕竟是一个中国人吗!这就深刻道出一个道理:即使外国的东西再好,也不能全盘照抄,也必须经过中国人的消化,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住脚。

其四,戏剧戏曲的论争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围绕着是“席勒式”还是“莎士比亚化”而展开的。一方而是出于急迫的心情,让戏剧成为实用的工具;一方面却是不顾戏剧的艺术特性。无论五四时期关于“问题剧”的论争,还是围绕曹禺的《原野》《北京人》《家》,以反夏衍的论争,看来是对于戏的主题思想的批评,而骨子里却是,宁要“席勒式”,也不要“莎士比亚化”。建国后,关于“第四种剧本”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样的分歧。

“文革”后,特别是80年代,环绕戏剧的论争,好像对历史争论的重复和继续,但是,这些论争的内容和意义更为深刻,更具有当代的特点。

虽然不能说,对于所有的历史,包括剧作、人物、事件、论争全部重新评估过,但是,环绕着以上几个基本论题的反思是深刻的。

对于戏剧和政治关系的反思,是对于“左”的戏剧政治功能的

厌恶和决裂,几乎所有戏剧文化的反思,都内蕴着对“左”的思潮的批判。对“四人帮”的批判是这样,对于其他问题,首先清理和扫荡的也是“左”的流毒。十分有意味的,尽管这样的论辩都力图超越摆脱“左”的影响,超越政治,注重学理;但是,这样的戏剧文化反思依然有着对清明政治的渴望和愿求。譬如80年代,持续最久的戏剧观大讨论,从学术角度评估,不能认为是高水准的,但是,就其对以往的戏剧文化中所潜藏的“左”的思潮,正统的戏剧意识和戏剧思维是一次巨大的反叛和冲击,依然具有其政治性。环绕着“样板戏”的论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细致而深入的辨析过程,清除剥离其中的或显或隐的“左”倾流毒,特别是那些潜在的负面影响,而将其中为艺术工作者所创造的艺术精华分离凸现出来。从论辩文章中,可以看到这是一次十分艰苦而细致的学术清理工作。

而围绕着对待传统和对待西方戏剧的论争,较之“文革”之前是更为错综复杂了,是各种各样的观点,尤其是大量涌入的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戏剧思潮的影响,在似乎多元的开放格局中,有了更为广阔的思路。譬如关于戏曲走向的论争、关于戏曲危机的论争,争论并非是非此即彼两分法,对一个问题有了更多的视角和向度。但是,这里仍然看到对于传统的基本态度。一是倾向于对传统的继承和传延;一是倾向于反传统的;再有,就是介乎两者之间的调和态度。

但是,令我们忧虑的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有些争论中,学术的含量日趋下降。最要命的,是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毫无研究的人,却大谈现代主义;对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毫无了解的人,也张口闭口“后现代”,把它作为一种时髦和时尚。出现了那种对于传统,包括话剧自身的传统一知半解,但还要反传统的革新家。在这些论争中,混乱着亦真亦假、不中不西、半生半熟、似是而非的杂音。而一些媒体的带有铜臭的明星崇拜、廉价吹捧,早已代替了真诚的批评和学术的公心,虽然不能说真正的学术争论已经消失,但却是看不到认真的论争了。在这样的意义上说,确是一种学术

的倒退了。

这部《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论辩》，是可以作为戏剧论辩史来看的。它大体上勾勒出百年来戏剧论辩的历史发展和演化，论辩的主要内容，论辩的形态。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今天依然可以给人们以启示。可以起到清醒头脑，辨识伪谬的作用，也许还有个更多的意外收获。但是，其中错漏，也一定会有的，殷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指正。

①陈来：《思想出路的三动向》，台湾《当代》1988年1月第21期。

本书撰写人员：

田本相 宋宝珍(上册)

刘方正(下册)

目录

绪 论	001
-----	-----

上编 戏剧部分

第一章 改良传统戏曲的先声	011
---------------	-----

一、中西戏剧文化的碰撞/012

二、改良旧戏势在必行/016

第二章 一场关于文明戏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	022
----------------------	-----

一、关于“新剧家”与新剧的性质/023

二、新剧与旧剧之关系/026

三、关于新剧的剧本与表演问题/030

四、关于新剧失败之原因的讨论/040

第三章 “新青年派”与新、旧剧论争	051
-------------------	-----

一、新旧问题的提出成为争鸣焦点//051

二、新、旧戏代言人的正面交锋//059

三、胡适、“易卜生主义”及“问题剧”/070

四、旧戏批判与新剧主张/085

第四章	“国剧运动”与戏剧论争	103
	一、在争鸣中强化“国剧”观念/104	
	二、反思“问题剧”与倡导现代戏剧/111	
	三、关于戏剧的文学性与演出性的争论/119	
	四、阐发传统戏曲的艺术价值/126	
第五章	关于《雷雨》、《日出》的论争	135
	一、关于《雷雨》的论争/135	
	二、关于《雷雨》是否是社会问题剧之争/137	
	三、关于《雷雨》中的“命运观念”问题的争论/142	
	四、是“结婚至上主义”还是现实主义/144	
	五、关于《日出》的讨论/151	
	六、曹禺的抗辩/156	
第六章	关于夏衍的剧本《赛金花》的讨论	175
第七章	关于戏剧的“民族形式”论争	188
	一、民众戏剧与“民族形式”/189	
	二、关于“旧瓶装新酒”的戏剧论争/193	
	三、“民族形式”的讨论的深化/196	
第八章	抗战时期关于历史剧的论辨	203
	一、郭沫若：“失事求似”，创造史剧/204	
	二、欧阳予倩：让“死”的历史在现代“复活”/219	
	三、陈白尘：“翻案”、“扭直”历史并非创作目的/226	
	四、历史剧问题座谈/232	

五、其他人的历史剧观点/240	
第九章 关于《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的论争	252
第十章 延安时期“演大戏”的论争	262
一、关于“演大戏”热潮出现的背景/262	
二、关于“演大戏”的讨论/265	
三、如何评价关于“演大戏”及其讨论/272	
第十一章 环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争论	274
一、在全国戏剧界推行学习斯坦尼体系的运动/274	
二、争论之一：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戏曲的问题/276	
三、争论之二：关于如何对待和认识斯坦尼体系 问题/280	
第十二章 关于“第四种剧本”的争论	288
一、关于《布谷鸟又叫了》的讨论/288	
二、关于《同甘共苦》的讨论/296	
三、关于“第四种剧本”的讨论/300	
第十三章 “十七年”关于历史剧的争论	303
一、关于《关汉卿》的讨论/303	
二、关于《甲午海战》的讨论/312	
三、关于《胆剑篇》的讨论/315	
四、关于历史剧理论的讨论/324	

第十四章	关于“演员的矛盾”的争鸣	329
第十五章	“文革”时期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批判	342
	一、一场批判“斯坦尼”的运动/343	
	二、批判“斯坦尼之流”/348	
	三、“四人帮”批判“斯坦尼”的深层动因/351	
	四、扫荡“斯坦尼流毒”/355	
第十六章	对斯坦尼拉夫斯基的再评价	363
第十七章	80年代“有争论剧本”的争议(一)	378
	一、《明月初照人》的争论/378	
	二、《马克思流亡伦敦》和《马克思秘史》的争论/390	
第十八章	关于《骗子》的争论	402
	一、关于骗子形象/403	
	二、关于干部队伍的问题/408	
	三、关于张老的形象/411	
	四、关于主题思想问题/413	
	五、关于真实性问题/415	
第十九章	80年代“有争议的剧本”的争论(二)	423
	一、关于《车站》的争论/423	
	二、关于《野人》的争论/433	
	三、关于《WM(我们)》的争论/442	